

## 开卷评书

## 写给村上文学的公开情书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伟

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绝对称得上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挪威的森林》一举成名以后,不到二十年即成为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阅读得最多的日本现代作家。

如果说村上是在日本文坛上的创作怪才,那么,本书《当心村上春树》的作者内田树则是百分之百的评论怪才。

为纪念该书出版而举行的内田树与柴田元幸的谈话就取名为“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而在本书中也有两篇分别题为《美妙的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和《用身体来阅读》的文章,分别引用了村上春树一段意思相近的话语:“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吧……如果用音乐来打个比方,那就像是‘泛音’一样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回到文学的原点去感受故事本身,感受共鸣,清楚地听到村上文学所发出的“泛音”,而不是噪音。

内田借助“泛音”这一音乐术语,来阐释村上文学在读者中拥有大批铁杆拥趸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村上春树是个深谙制造泛音技巧的作家,让忠实的读者们萌生一种“被选中的收信人”的感觉。而村上“完全不受评论家们的好评”这一文坛事实愈强化了读者们的信心:“那么,我现在聆听着的这个泛音,是唯有我才能听到的。”于是,内田树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独辟蹊径地来解读着村上文学俘获读者的秘密。

此外,该书还以“‘父亲’的缺位”、“扫雪工”等为关键词来引领我们走进村上文学的迷宫。

内田树注意到村上文学有着一个重要的格局,那就是几乎所有故事都没有“父亲”。内田写道,“父亲”存在于世界各地,无论在何处都发挥着同样的机能。不过,在每个地方都以“不同的形态”显现,并散发出“不同的气味”。可一般的作家都误以为与自己争执不休的那个“父亲”,也就是众人的“父亲”,可遗憾的是,于他而言的“父亲”,仅仅是他个体世界中的“父亲”,因此,即使凝聚了全部技巧去描述自己与“个体父亲”之间的纠葛,亦无法赢得文学的世界性。而村上文学却以父亲的缺位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穿越了国境,并悄然地问道:“在‘父亲’缺位的世界里,被放逐到没有地图、没有指针、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政治性的正确行为规范’手册等这样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中,尽管如此,我们能否在这样的状态下成就‘某种善的事物’?”

在内田看来,村上春树是给出了肯定答案的。那就是做一个“扫雪人”。“一旦下雪,人们就会明白,尽管‘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然而,这工作若是没有人干,最终大家都会非常为难。说来,这工作几乎没机会得到好处。可恰恰是多亏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扫雪’人,世间不利的胚芽才得以被摘除少许。



《当心村上春树》内田树著 重庆出版社 2009年3月出版

我想,这就属于那种“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吧。”为了保护所爱之人免受“用老虎钳糟蹋猫爪的邪恶力量”,扫雪人默默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也并不奢望什么特别的报酬和褒奖。也正因为有人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清扫积雪”这一日常性的努力,才总算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上阻止了“超越常规的邪恶力量”的渗透。在内田看来,这就是村上文学反复讲述的、能够触动所有人心弦的“根源性的故事”。

村上文学的热潮与消费社会的关联性常常成为评论家所探讨的对象。显然,消费社会的急速发展给大都市罩上了空虚和倦怠的空气,以至于人们在当今这个“父亲”缺位的社会里备感不安,催生了迷惘的年轻一代。村上文学中弥漫的失落感恰好代了找不到生活目标和航海图的人们的迷惘。但正如村上文学反复讲述的那样,世间充满了邪恶的力量。面对随时可能入侵的邪恶力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扫雪,做没有回报的工作,或是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们遭遇危险时悄悄出手相救。而村上文学的孩子们就是从这里找到了克服失落感的妙方,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虽然确实平淡无奇,但却在某个地方与灵魂的配电盘连在了一起。

内田就是这样来感受并言说着村上文学的魅力和世界性。他毫不含糊地坦陈自己对村上文学的喜爱,以至于本书被不少人称之为“写给村上文学的公开情书”。正是这种坦白让他摒弃了评论家惯常保持的自矜和冷静,而以村上读者的鲜活身份诉说着从中听到的泛音。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内田的全部,那无疑是被内田“骗婚”了。正如他的一本书名《我的身体有一个好用的脑袋》所表达的那样,他以身体为前提,也运用着智慧的大脑。他在冷静的评论家和疯狂的村上文学迷这两种身份之间走着钢丝,在感性和知性之间来回游弋,并保持着微妙平衡。否则,他就不可能向我们发出村上式的泛音,而只能传出质朴但是单调的基音了。正如村上春树是依靠将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这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赢得读者一样,内田树是依靠将身体与脑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评论怪杰的。

显然,内田树的村上文学论提供了一种接近村上文学本质的解读方法。不过,即便它非常有效,甚至可能是村上迷最容易共鸣的解读方式,却也只能是无数方法中的一种。而且这种方法是以前其他方法的复数存在为背景,才彰显其独特价值的。不注意到这一点,也许就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偏激或迷失。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要当心内田树,就像得“当心村上春树”一样。(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所长)

## 寻找中国企业家基因

文\本刊特约撰稿 于小星



《跌宕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

看吴晓波《跌宕一百年》,很容易叫人想到是《激荡三十年》在市场上成功试水之后的一个衍生品,好在这个衍生品还是有点意思,虽然很多人讲,里面也还是有一些硬伤。

从动机的角度来讲,激荡是势头更猛,跌宕是曲折更深。确实,《跌宕一百年》叙述的1870—197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实在是曲曲折折。而在一种历史的曲折背后,吴晓波试图找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而这种形成到底仅仅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并且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于是这种探寻可以一直延展到今天新生企业家阶层,使其自我反观、寻根和确认,确认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并且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来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而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啻为一场具有解放性质的评估和确认。

确实,在之前的《激荡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如何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却也不可逆转地向商业社会转轨的过程。而在未来,如果依然希望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

给更多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的话,那自然有必要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了解中国企业和企业的历史进程。于是从这个角度也更能理解《跌宕一百年》的文本价值。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说过“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而三十年远远不够,一百年也才不过是个开始。

而如何将这种“负重”的开始写的比较有意思,确实是吴晓波比较拿手的。他无论是书写三十年,还是一百年,都能够比较着力于历史上某种具有共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质,即在所有的历史事件抽丝剥茧之后,其实质都是人性这样东西。正如在《跌宕一百年》中,吴晓波笔下的中国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被带上了某种悲壮的色彩。他们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也一定程度上身怀了报效祖国的深沉感情,并且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是可惜在改变的过程中,有种种不可抗力。而所谓时代重命,在今天看来,他们也是承担不起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承担本身还是叫人动容。

确实,中国的情况总要现实的看,当时太多企业家被顶上了各种帽子,而这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也是颇失精准的。所以吴晓波所做的,也是试图还给这些人一种公道,正如他在文字中讲的:“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坚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坚强的国家。”

可见,《跌宕一百年》的确很难说只是单纯的中国企业变革史,在这些企业背后,在这些企业家背后,也许确实存在一种民族精神。而在一些时刻,重提这种民族精神,未尝不是一招好棋。

## 热书热评

## 爱国的“道”和“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英杰

在时下的中国,“爱国主义”是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头,我们也有幸得以窥见各种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堂而皇之进行的廉价且哗众取宠的表演。应当说,这些活动本身除了口号疑似“爱国”之外,并无半点爱国的成分。如果硬是将其和爱国主义挂钩的话,那么也只能将其叫做“变态爱国主义”。

厦门商人蔡铭超眼见着从圆明园外流出去的所谓“国宝”要在法国商业机构拍卖,竟然丧失了商人最起码的判断力,未加思索就冲进了那些法国商业机构故意为中国买家所设下的一个抬高价格、击鼓传花的局。虽然怀着“爱国”的初衷,却中了人家的套,充当了一回抬轿子的角色。他还错上加错,公开表示“不付款”。这种违反商业或者法律底线的所谓“爱国”之举,实不可取。

相比而言,《中国不高兴》的作者群的“纸上爱国主义”似乎文明多了。这帮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自然不屑于骂大街,也不爱好街头的罢买抵制,而是靠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弥漫于当代中国上空的极端民族主义煽风点火。

不过,虽然形式文雅,却也只不过就是关起门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意淫”。比如,这本《中国不高兴》一再鼓吹中国要把美国当成头号假想敌,极力揶揄“打倒拳王”,甚至砸碎“拳坛”……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东风吹,战鼓擂,如今世界谁怕谁”式的昂扬文字,读起来诚然像鸦片一样过瘾,但深究起来是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里面的货色最早都可以从义和团的纲领里找到其滥觞,最近的也可以从文革中找到踪迹。

其实,同样一场的把戏,这帮自称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中国可以说不》中玩过。当时,的确是赚了银子又赚了些虚名的。而今,10多年过去了,之所以故技重演,在“老皮袄”上面套上件“新马甲”,继续兜售那些激进主义的“春药”,无非也就是想利用爱国主义的名号赚些银子花花而已。这一点,过去少有人看明白,今天有了互联网,恐怕玩起来就有些不那么顺溜。毕竟,中国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好糊弄了。

必须声明的是,在这里批评上述几种的变态的爱国主义行为,并不是反对大家爱国。爱国是必需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爱国一定要遵循一定的“道”和“度”。要懂得如下的常识:爱国不以其道,不但不会强国,反而是足以误国乃至害国。

(作者系山东烟台 资深传媒人)

## 延伸阅读

●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韩咏红《〈中国不高兴〉:虚火旺的民族主义》

●第一,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外族欺负,民族主义是需要的,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中国是我们的家园,谁来欺负也不行;第二,民族主义是一面大旗,民主主义是另一面大旗,两面旗我们都要高举。如果只鼓动民族主义,不鼓动民主主义,那就只能达到义和团水平。

——李银河《对中国不高兴的两点评论》

《中国不高兴》一书的面世,让我们见证了部分中国人的血性,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前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趋势。有争鸣才会有进步,有碰撞才会有火花,思想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那个儒、墨、道、法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至今仍令人悠然神往。

——乔志峰《中国能否“不高兴”?》

这么些作者都是很令人敬佩的人,他们在做不讨人喜欢的事情(要讨人喜欢就必须摆出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鞭策一切中国的东西),他们开创性极富挑战性的话题,有理想并为理想而呐喊而奋斗,在今天的中国是属于稀罕义举和逆势而作。

——帽的文鱼:《〈中国不高兴〉好在作者认真思考》(魏辑)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著

## 有错即改

因为编辑和记者沟通有误,本刊上期B7版《印象王潮歌》一文,误把记者从网上下载作为资料链接的文字署名海南日报记者予以发表。特此向读者致歉。原创和署名的真实性是本刊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原则,今后我们一定吸取教训,不断增强编辑记者的责任心,杜绝此类事故发生。海南周刊编辑室